

071124

杨贤江文选

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二版

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

李维平 著

D43
a7

~~D4~~
~~38~~

D432.62

9

61-5

071124

忠源选编

杨贤江文选

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

000012563

天津人民出版社



SZ0012734



杨贤江文选
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
钱忠源 选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2插图 157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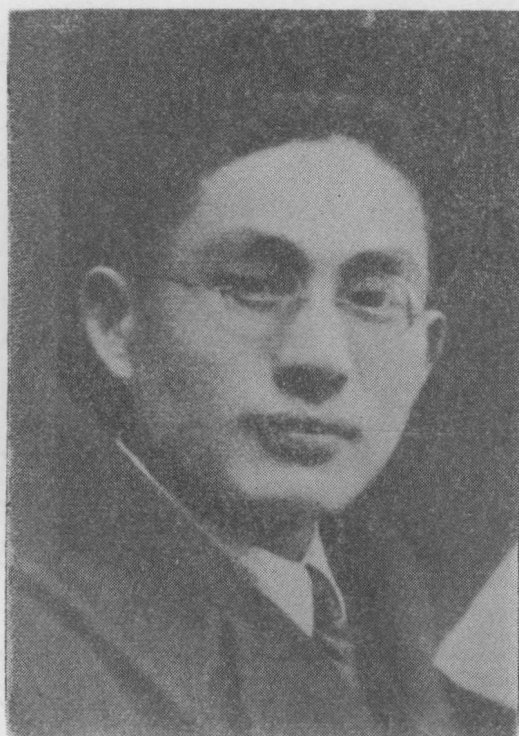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3072·578

定 价: 0.73元



SZ0012734



杨贤江同志 (1895—1931)

序

叶圣陶

杨贤江同志逝世于三十年代初期，我跟他结交仅有十年。十年不能算长久，可是前一段我们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后来他病了，我常去看望他夫妇俩，所以我能大略知道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

贤江同志是一位极端认真的实干家，从日常生活到从事工作，他都讲求踏实力行，丝毫不肯马虎。他的生活极有规律，起床，体操，读书，工作，休息，他都给自己规定在时间表上，严格照办。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学生杂志》，在会客室里，跟来访的青年谈话的时候相当多，在编辑室里，埋头在读者的来信堆里的时候也相当多。他根据来访者和来信者提供的材料和提出的问题，写成“通讯”刊登在《学生杂志》上，每期八九篇十来篇，有一期多到二十篇。这些“通讯”有的反映青年学生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情况，有的讨论学校里的问题和社会上的问题，全都是牵系在青年们心上的事。在恽代英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创刊之前，联系知识青年这样密切的刊物就只有《学生杂志》一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革命斗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

《学生杂志》每期登载十来篇“通讯”，贤江同志还嫌不够，于是开辟了“答问”一栏，简明扼要地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由贤江同志回答提问的读者共有七百多人，问题一千多个，单看这个数目，他的工作量就大得叫人吃惊了。《学生杂志》不是共产党的刊物，贤江同志又不是《学生杂志》的主编。当时是军阀统治时期，要在此时此刊宣传革命，真够费劲的了，一方面要抓住各个切当的时机，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尽最大的可能去影响青年学生；一方面又要妥善地应付恶劣的环境，处好种种复杂的关系。因此贤江同志的工作看起来好象挺平常，其实是极不容易的。

现在选取贤江同志当年登载在《学生杂志》等刊物上的文章，编成这本《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出版，我认为挺有意义。其一，谁都要讲求修养，青年正当发展成长的旺盛时期，尤其要讲求。其二，贤江同志谈青年思想修养的这些文章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写的，对现在的青年还极其切用。因此，出版这本书不仅为了纪念贤江同志，也是对广大青年最好的贡献。

我说“对现在的青年还极其切用”，试举几个例子。贤江同志谈求学是这样说的：“把求学限定是读书，把求学与做事绝对的画分，这都是错误的。学生是求学的，学生是读书的，但不能就说求学即读书，读书即求学。”（《求学与做事》）

简要的几句话，贤江同志把古来多数读书人的错误观点揭出来了。清朝末期废了科举，办了学校，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了民国，仍旧办学校，承袭古来错误的读书观点的人依然不少，直到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种错误的读书观点还没有在社会上和学生中断根绝迹。贤江同志点明求学和读书之间不能用个“即”字连起来，意思就是读书只是求学的一个项目，此外

还有很多项目，就是从事物物中读不用文字写的书，也就是跟事物物直接打交道，做各色各样的事。所以他说把求学与做事绝对的画分是错误的。他的意思就是求学和做事应该一直同时并举：求学的时候不光是求学，还要做些切实的事以期学得扎实；做事的时候不光是做事，还要继续深造，更求精进。这样的观点，在建设社会主义，期望早日完成四个现代化的今天，不是非常切要可贵，值得教育界和在校青年、从业人员作为座右铭的吗？

贤江同志主张求学和做事都要究明动机。他说：“我们求学，我们做事，都有他正当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什么？就是为了贡献人类，为了利益社会。出于这个动机而求学办事的，就是纯洁。不出于这个动机而出于赚钱、得势、享名、行乐或别种狭隘的私利的动机而求学办事的，就是不纯洁。（《动的青年修养》）

我读这几句话，对贤江同志的虔敬心情无法描摹，只能说这样一句话，“贤江同志呀，您真是个纯洁的人！”同时我诚恳地祝愿当代的青年，希望你们求学和做事全都出于这样的动机，因而全都成为纯洁的人。

贤江同志提倡做人要做主动的人。他说：“在主动的人，他常常觉得有许多事要做，常常要提出问题来解决，常常想法子来应付环境当中的困难。所以他能独出心裁，独辟蹊径，不因循，不偷惰，也不嚣张。但在被动的人，若是外界没有刺激进来，他就会漠然不动，就是动了，而动的程度与时期也以刺激的程度与时期来规定。他不能做过于刺激的分量与性质的事，因为他自身原来没有发动的力量，自然不能自作主张，自出意匠，但当受着刺激的时候，他也许有热烘烘的态度，气扬

扬的行动，不过这自然是一时的发狂，等到刺激去了，就会消灭了的。”他又说：“做前面一种青年，那是做人的材料，做后面一种青年，那是一种做器的材料。……成人乎？成器乎？就要看动的态度来分判。”（《主动与被动》）

“成人乎？成器乎？”你不想修养，不愿修养，当然不成问题。如果要修养的话，这就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我恳切期望当代青年重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不再举例了，请青年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自己细细体会吧。因为自己体会得来的比听人指说的更为深刻，更为切用，这是教育学方面极为可靠的常识。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六日作

序

潘懋元

杨贤江同志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又是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他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有关青年教育与青年修养的文章和书信，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些文章和书信，不但在当时起着引导青年、鼓舞青年走向革命的作用，今天仍有教育青年、指导青年健康成长的现实意义；不但对青年人有着直接的教育意义，对于从事青年教育工作的教师 and 政工干部，更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贤江教育文选》，着重选编有关教育原理和教育发展史论著，当然也选了若干有关青年教育的文章和书信，但数量较少，不足全面地反映杨贤江关于青年指导的观点、原则、方法与丰富的内容。天津人民出版社编选的《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这本书，集中地选编了杨贤江关于青年修养和青年教育的文章，既可补前书的不足，又方便于广大青年和青年教育工作者的学习。对于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光辉的思想，对于当前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地具有重大的意义。

杨贤江关于青年指导的文章，写于五十多年前。五十多年的中国历史，时间虽不算长，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

阶段，而且中间还经过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社会主义的今天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二、三十年代，不但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文化科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在这样不同的时代背景的青年，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是不可类比的。但是，历史的发展又有延续性与继承性：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的精神财富，而其糟粕却成为后代人沉重的精神包袱。不可否认，封建主义的余毒至今尚未肃清，在十年动乱中还有所滋长；资本主义思想和生活方式仍在不断侵害和影响青年人的思想和行为。杨贤江针对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实际所提出的某些意见，仍值得我们参考，他教育青年、指导青年的原则与方法，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

下面，谈谈我学习杨贤江有关青年指导理论的几点体会：

（一）杨贤江关于青年指导的基本观点是：以树立革命人生观为核心的“全人生指导”。杨贤江认为对于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最根本的是“人生目的”的教育，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他分析当时青年学生中，存在许多错误的思想和问题。如有的沉醉在古书堆中，有的糊里糊涂混分数；有的不问国家社会，只顾自己的私生活；有的随波逐流混日子；还有的因无力升学而悲观消极，有的因对政治不满而想遁世隐居，有的因失恋而想自杀等等。他认为这些表现都是由于缺乏革命的人生观，或虽有朦朦胧胧的改造社会的要求而缺乏信心与勇气。因此，不论从社会改造或个人改造来说，关键在于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使青年立志改造社会。他说：“人生的目的，在于对全体人类有贡献，来促进人生的幸福”。“世事的好坏，大概是由制度环境造成的，我们做青年的，应该有积极的爱世的人生观去从事改革。”对于青年学生来说，首先应当解决两个问

题：(1) 我们为什么求学？(2) 我们和社会国家有什么关系？他指出，求学的目的在于“改良并丰富人类的生活，在于获得人类普遍的幸福”。青年求学的大目的，实在只有“为改造社会”五个字，“无论研究何种科学，都要抱着‘为改造社会’的存心”。

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在青年中最大的障碍是享乐的人生观。享乐的人生观使人一生无大志，只是“专谋自身快乐”。他认为持有这种人生观的人，把这个“人”字看得太小了。他们不懂得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谋“全体人类的利益”。同时，由于他们“过分重视物质生活”，“专谋自身快乐”，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上，剥削人民的利益以享受豪奢放纵的生活，这种人，自身也得不到“真正的幸福生活”，因为“圆满的人生是心身调合的发达”。物质享受而精神空虚的人，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所以，树立革命人生观，“先要自我解放”，不可“独善其身”，而应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个人。

为了教育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立志改造社会，他鼓励青年学习新兴社会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在二十年代初，他就提出学校里应当以“唯物社会观”教育学生，开设“社会运动指导”课程。在他所编的《学生杂志》上，除了发表大量的论述革命人生观与社会改造的论文、短评之外，还指导学生阅读《社会科学概论》、《马克思学说概要》、《资本论入门》等社会科学著作，并介绍《向导》、《前锋》、《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以及苏联当时的革命书刊，号召青年走马克思、列宁所指引的道路。

正如杨贤江所指出，青年“对于人生的问题，总该有个确定的观念”。青年，正是人生观初步形成的时期。树立革命的

人生观，反对享乐的人生观，同样是今天青年指导的根本问题。今天，有些青年所缺乏的正是革命的人生观，为“四化”建设，为人类幸福服务的远大理想；他们所孳孳营求的物质享受、舒适生活等等个人“实惠”，正是由于把“人”字看得太小，或者干脆说就是把自己看得太小了。对于一个看不起自己的人，什么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组织纪律教育，什么舍己为人，公而忘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四化”等等大道理，如果不是逆耳之言，也是耳边风而已。杨贤江总结他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的经验，认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根本在于“人生目的”的教育，对今天青年教育工作者仍然是重要的启示。

但是，青年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青年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是各色各样的。对于青年人的正当需要，应当力予满足；对于青年的指导，不能只限于讲革命的道理；反对享乐的人生观，不是要提倡禁欲主义。杨贤江认为必须全面关心青年的生活，对青年进行“全人生指导”，帮助青年过“正常生活”。杨贤江所指的“全人生指导”有广泛的涵义，既指德、智、体，知、情、意的全面教育，也指对青年的求学、择业、交友、恋爱、家庭以及为人处世、兴趣爱好的全面关心与指导。他说：“向来的学校教育，大都偏于知识的传授，而对于良好习惯的培养，青年问题的探索，未尝加以留意。换句话说，就是未能为全人生的指导；于书本的教室的课业以外，对于如何过日常生活，如何交友，如何消闲，如何处世，如何发现并解决本身各种问题，如何满足并发达学生所喜欢做的活动，都在所不问，这怎能完成他的指导人生的职责呢？”（《中学训育问题的研究》1925年）他认为青年问题，

就是在青年的生活上所发生的困难，凡是青年生活上发生困难之处，青年工作者都应尽力帮助他们解决。杨贤江编辑《学生杂志》的指导思想，除了引导青年立志改造社会之外，可以说就是贯穿着“全人生指导”的思想。《学生杂志》既突出思想政治教育，也兼顾青年各方面的问题与需要。除刊载自然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各科知识和学习方法的文章外，对于青年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生理现象、体育锻炼、品德行为以及社交、恋爱、婚姻、家庭、就业、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占相当篇幅，并经常组织学习、生活问题的专号，借以指导青年过健康的正常生活。他认为：一个革命的青年，应该是一个过健康的、正常生活的青年。指导青年立志改造社会与过“正常生活”是一致的。而杨贤江同志自身，就是一位革命与生活结合得很好的典范。

多年来，我们对于青年的指导，着重于政治立场、阶级觉悟，这是必要的；但是，对于青年人生活中的问题与需要，很少注意，甚或避而不言，怕关心与指导他们的生活问题，会被指责为“不突出政治”。以致德育内容简单枯燥，同丰富多采的青年生活与青年心理严重脱节，青年指导效果不够理想。杨贤江的以树立革命人生观为核心的“全人生指导”这一基本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二）如何看待青年问题，是做好青年教育工作的前提。青年问题的形成，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青年身心发展的特征。既要从社会发展的要求去确定青年指导的方向、任务，又要根据青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去研究青年指导的原则、方法。杨贤江就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点和教育观点来看待青年问题，分析青年问题，对于形成青年问题的社会的、心理的

因素有着深刻的认识。

首先，他不是孤立地去看待青年问题，而是把青年问题摆在整个社会问题中来研究，看作是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问题在青年身上的集中反映，从而把教育青年、解决青年问题与改造社会制度紧密联系起来，看成是革命者的责任。

杨贤江分析当时的社会，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官僚地主重重压榨，加上天灾频仍，农村破产，民不聊生，以致大多数青年，失学失业；少数青年，幸得上学就业的，但在这样社会大熔炉中，难免被融化侵蚀。所以，不论是对于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或是解决青年的失学失业以及婚姻、家庭等问题，都不应“就事论事”，零零碎碎地解决，必须从改造社会入手，“求得政治经济问题的总解决”。而要改造社会，就必须参加革命。革命不是个人力所能及，必须组织起来。他于1923—1924年间，在《学生杂志》上，组织了一次规模宏大，连续数月的学生“干政”与“入党”问题的讨论，全国各地青年，纷纷参加，影响很大，使许多学生认识积极干预政治，参加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为发展党团组织，做了思想准备。

其次，他不是抽象、静止地看待青年问题，而是根据青年身心发展的特征，去分析青年问题。他认为青年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问题，涉及到青年人生理上、心理上发展到特定年龄所产生的问题。他认为必须正视青年人的意志、性格、兴趣、情感的特点，求知的欲望，以及生理的需要，按照青年自身发展的规律，正确引导与妥善处理青年的各种问题。杨贤江对于青年期的生理、心理，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他认为青年期以前，身体发育

尚未成熟，“自我观念”还不发达，社会上的种种事情，还不甚理解，思想很简单。青年期由于性的成熟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完善，“自我观念”骤然发达，能明人己的关系，发展了好群、利他、同情、自炫等等所谓“社会的本能”。人世间的种种事情都要来萦绕青年的心意，从而也就有种种良好的或不良的社会性行为发生，迫切需要得到正确、及时的指导。所以，研究青年问题，既要从社会的角度看，又要从青年自身的角度看；解决青年问题，同样既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又要遵循青年身心发展规律。因此，他极力反对那种“第一不从学生本身着想，第二不从社会环境着想”的旧训育方法。这种旧训育方法除了规定几条应守的校规，讲解几个好听的德目以外，其他一概不加考虑；只靠“僵死”、“空洞”的说教，不能以理服人，束缚了青年思想与个性的发展。

今天，青年的社会环境不同于旧中国的社会环境；青年人的身心发展，在改善了的生活条件与社会主义的教育条件的影响下，它的特征也不尽相同。但是，杨贤江反对旧的训育方法，主张从社会环境和青年身心发展特征来考察青年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仍然是值得我们青年教育工作者深思的。

（三）杨贤江指导青年，在方法上也有许多可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他重视调查研究，因此解决问题有针对性，指导意见合情合理，有说服力。杨贤江平时同青年有广泛的联系，随时搜集整理来自全国各地青年所反映的材料。他对于青年生活背景，思想感情，洞察精微。他所写的青年指导文章，不发空泛议论。如《中学训育问题的研究》、《好习惯怎样造成》、《勸自学者》等有关青年问题的重要文章，都是根据各地青年所反

映的实际情况与问题，加以分析综合所写成。这些论文事实确凿，析理深刻，有独到见解，使青年们感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在同青年们的通讯来往中，他对于不同处境，不同思想状态的学生，往往提出不同的指导意见。如对于愤世嫉俗，思想消沉的青年，鼓励他们要正视现实，关心时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于慷慨激昂，夸夸其谈的青年，劝导他们要做对社会对群众切实有益的工作；对于满腔热情，愿为宣传群众，改造社会贡献力量的青年，指导他们要团结同志，参加组织，深入群众，讲究工作方法；对于家庭富裕，重视学业的在学学生，希望他们除了正课学习之外，要学点新兴社会科学，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对于家境贫困，无力入学的青年，提出“无产者不必定要入学校读书”的口号，列举许多自学成才的科学家、思想家的例子，并且开列自学书目，指导他们自学方法，鼓励他们刻苦自学，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信心。

杨贤江对于青年指导的成功，还在于具有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教育家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写了三百多篇论文与短评，公开发表的通讯百多封，答问千余则。其中绝大部分是教育青年的言论，回答青年的问题。它所涉及的范围，大至国际形势、国家前途、革命事业、社会发展，以及人生意义、教育制度等等问题；小至兴趣爱好、起居生活以及如何记日记、如何处理日常生活。有的通讯、答问、几句话就解决；有的则花上几个月的准备，写了洋洋数万言的专论。不论是长篇论文，或者寥寥数言的短简，都充满了对青年们严肃的态度，真挚的感情，不厌其烦的耐心。正是由于他的精辟见解和热情耐心，使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仰，把他引为良师和知心朋友，向他倾吐内心的思想感情。